

台湾青年学生与保钓

褚静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摘要: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美国为了维护其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利益,于1971年6月17日,与日本签订了“冲绳返还协定”。1972年5月15日,美国擅自将琉球群岛、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交给日本。在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坚持琉球不是日本的固有领土,钓鱼岛属于中国,反对美国将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交给日本。在海外保钓运动的鼓舞下,台湾青年学生自发组织起来,集会游行,抗议美日私相授受钓鱼岛。蒋介石政权加强对保钓游行示威的管控,疏导青年学生的激情。台湾青年学生的行动在保钓运动史上写下了重要一页。

关键词:台湾;青年学生;保卫钓鱼岛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05X(2014)02-0073-09

The Youth Students in Taiwan and Protecting the Diaoyu Islands

CHU Jing-tao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China)

Abstract: Diaoyu Islands and its affiliated islands are an inseparable part of the Chinese territory. In order to safeguard the strategic benefit in the western region of the Pacific Ocean, the U. S. signed the Okinawa Reversion Agreement with Japan on June 17, 1971. The U. S. reverted the Ryukyu Islands to Japan on May 15, 1972, including the Diaoyu Islands. Chiang Kai-shek's regime in Taiwan thought that the Ryukyu Islands was not the innate territory of Japan and the Diaoyu Islands are one part of the Chinese territory. It continually opposed the U. S. to give Japan the administrative power of the Diaoyu Islands. Under the encouragement of the movement of protecting the Diaoyu Islands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many youth students in Taiwan paraded in the public squares and protested the action of transferring the Diaoyu Islands between the U. S. and Japan. The Chiang Kai-shek's Regime took some steps to control the movement of protecting the Diaoyu Islands in Taiwan and softened the patriotic emotion of most youth students. Their efforts wrote one important page in the movement of protecting the Diaoyu Islands.

Key words: Taiwan; the youth students; protecting the Diaoyu Islands

1970年代初,台湾一批进步青年学生,著写文章,发起示威游行,反对美国、日本私相授受钓鱼岛,在保钓运动史上写下了重要一页。由于多种原因,其长期得不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为此,笔者不揣浅陋,对1970年代初台湾青年学生的保钓运动做初步探讨。不当之处,尚祈海内外方家批评指正。

一、钓鱼岛之争突起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简称钓鱼岛)位于我国台湾岛东北方,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及其附近的3个小礁组成,陆地总面积约6平方公里。岛上没有居民,附近海域是闽台地区渔民的传统捕鱼作业

区。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琉球群岛位于太平洋上、东海之中,陆地总面积约有 3000 平方公里。在古代,中国与琉球保持着宗藩关系。1879 年,日本吞并了琉球。

1894 年,日本挑起甲午战争,中国战败。1895 年,日本政府逼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侵占了台湾岛、澎湖列岛,窃取了钓鱼岛。

1945 年 10 月 25 日,台湾光复,中国政府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1949 年后,蒋介石政权退守台湾。

1951 年 9 月,对日媾和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市召开,签署了《与日媾和条约》,即《旧金山和约》。在领土条款的第三条中规定“日本对于美国向联合国提出将北纬二十九度以南之南西诸岛(包括琉球群岛与大东群岛)、孺妇岩岛以南之南方诸岛(包括小笠原群岛、西之岛与琉璜列岛)及冲之鸟岛与南鸟岛置于美国托管制度之下,而以美国为唯一管理当局之任何建议,将予同意。”^①美国按照自己的意志安排,长期军事占领琉球。

1945 年后,美军拥有钓鱼岛的军事管辖权、行政管辖权,而台湾省渔民在钓鱼岛海域作业,拥有钓鱼岛的实际使用权。美国琉球民政府没有提出异议。

1966 年,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成立了“联合勘探亚洲近海地区矿物资源合作委员会”。1968 年,该会发布研究报告,称在琉球群岛、台湾至日本本土间的大陆礁层边缘地带、黄海及渤海,都可能蕴藏有丰富的石油资源。

日本政府立即采取行动,于 1969 年 5 月 8 日派人登上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在每个岛上建立了一块钢筋水泥的标牌。1970 年 7 月,美国琉球民政府开始在该海域进行巡逻,于 7 月 7 日至 16 日,在 5 个岛屿上设置了英文、中文、日文的警告牌,对非法进入者提出警告。

若承认美国琉球民政府禁止台湾渔民进入钓鱼岛海域的安排,蒋介石政权等于自动放弃在钓鱼岛海域的捕鱼权、石油资源,更涉及到东海大陆架的划界工作。

领土争端包括民间、民事、外交、军事等层面。从民间的自发行动,到政府的公开声明,协商谈判,直至军事手段解决,是一个不断升级、扩大的过程。台湾当局依附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与美国、日本是军事盟友的关系,根本不可能采取任何军事手段来挑战美国对琉球群岛、钓鱼岛的安排。日本的佐藤荣作政府亲台反华,日本政府给台湾当局大量的直接投资、日元贷款、技术支持,在联合国支持蒋介石政权保留席位,反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对于这样一个盟友,蒋介石政权是不敢公开撕破脸皮的。为此,蒋介石政权一方面要尽量争取并维护在钓鱼岛海域的实际使用权,同时,又不能公开与美国、日本为敌,只得将维护钓鱼岛权益的行动尽

量控制在民间层面、民事层面,避免上升至“外交”层面,与美国政府、日本政府发生正面碰撞。

此时,日本政府称钓鱼岛是“日本的领土”。1970 年 8 月 10 日,日本外相爱知揆一在日本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会议上说,“尖阁列岛属于日本,中华民国政府任何片面主张对这个群岛其沿岸浅海区域的权利,依国际法上应认为无效”^②。

为了回应日方的指责,8 月 21 日,“中华民国外交部”发言人魏煜孙,对日本政府对我在大陆礁层钓鱼台列屿(日方称尖阁群岛)海域探勘资源问题,发表谈话:“关于此一问题,我政府已将我方立场明白告日本政府,根据国际法原则与一九五八年签订之《大陆礁层公约》,中华民国对于台湾以北大陆礁层资源有探勘及开采之权。”^③

8 月至 9 月,台湾的报刊杂志《中央日报》、《联合报》、《中国时报》、《自立晚报》、《中华杂志》,以及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监察院”、“立法院”、“国民大会”、台湾省议会等,都指出钓鱼岛是中国的一部分。

为了维护在钓鱼岛海域的实际使用权,蒋介石政权采取行动,从历史、法理、地质、实际使用等多个层面,论证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普及钓鱼岛的知识,动员一些民众向美国政府施压,拉开了维护钓鱼岛权益运动的序幕。

二、战后一代青年开始自我觉醒

1949 年,蒋介石政权在中国大陆彻底失败,退据台湾,实行军事戒严,严密管控台湾社会。面对台湾民众要求直选的呼声,蒋介石政权于 1950 年推行县市长直选、县市议员直选,落实地方自治,开启了台湾战后的基层民主。推行新台币改革、土地改革、国民党改造,加上美国的军事援助等,蒋介石政权终于在台湾稳住了阵脚。

国民党政权吸取了在大陆失败的经验教训,采取了政经分离的发展政策,严厉限制上层民主政治,一党独大,采有计划的自由经济政策,强调均富,扶植民营企业的成长,大力发展经济,创造了台湾经济奇迹。绝大多数民众分享了台湾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果实。

^①《旧金山对日和约》,《国际条约集(1950—1952)》,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335—336 页。

^②《钓鱼台群岛问题年表》,〔日〕浦野起央、刘魁朝、〔日〕植荣边吉编《钓鱼台群岛(尖阁诸岛)问题·研究资料汇编》,香港励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79 页。

^③《“外交部”发言人表明我政府立场》,台北《中央日报》1970 年 8 月 22 日,第 1 版。

作为台湾地区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教育中心,台北市在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在大学校园,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学者和理想主义的青年学生成为引领台湾社会求变求新的先锋力量。

1960年代前期,在蒋介石政权的严厉统治下,多数知识分子视参政为畏途,远离政治。台湾社会暮气沉沉,民间自发的示威游行或自办刊物,只要有一点抗议和批判精神,就会被压制下来。青年学生从小被灌输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诸如四维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要对“党国”绝对效忠,对国民党政权绝对服从。一批青年大学生在经济上没有前途,在政治上没有出路,在思想上没有方向,苦闷彷徨。大学毕业后,他们缺乏担当,各奔前程,置国家、民族、社会、大众于不顾,到美国留学是他们的出路之一。“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反映了当时一些青年学生的崇美留洋心态。

1945年后出生的台湾新一代青年学生,到1960年代末,长大成人,基本上在较为稳定的环境中生活,享受到台湾经济起飞带来的物质利益。一批充满朝气的青年学生受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台湾大学学生邓维桢、刘容生等人创办了《新希望》杂志,鼓吹思想自由,呼吁同学自觉自省,要关怀国家民族前途,不能一味颓废自私,只顾自己的出路。国民党的政战系统一向视自由主义为“危险思想”,台湾大学校方停刊《新希望》,指其设有各校联络人,违反了救国团的规定,学生不得有跨校的组织活动。

《新希望》停刊后,林孝信率一些理工科的同学,和《新生报》接洽,将其《儿童周刊》改为《科学周刊》,邀集同学们写稿,向中学生介绍一些科普常识。

1968年,邓维桢在台北创业,创办《大学杂志》。由于缺乏资金,难以为继,改由丘宏达担任名誉社长、杨国枢担任总编辑,许信良、胡佛、陈鼓应等一批青年学者加盟,鼓吹民主自由,成为台湾改革派的舆论阵地。

台湾青年学生从小受到的历史教育就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屠杀,感同身受,面对日本抢占钓鱼岛,自然爆发出来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1970年8月,台湾主要报刊杂志大幅报道台湾与日本的钓鱼岛争端,广大青年学生深受刺激。

1970年10月,王晓波奋笔疾书,写成《钓鱼台不容断送》一文,引用了“五四宣言”中的一句话“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他大声呼吁:“在这段苦难挣扎的岁月里,每一个中国人都应了解到‘外抗强权,内除国贼’是我们建国唯一的方针。但二十年来台湾的繁荣和安逸却似乎使我们忘记了这些血的教训。从废墟中重建的

强邻日本,使我们钦佩,也使我们疑惧。似乎人心是贪婪的,帝国主义终于没有死心,经济强国渐伸出了侵略者的魔掌,巧取了琉球,正准备豪夺属于中国领土的钓鱼台。”^①

王晓波将文章投给《大学杂志》,编辑因其言词过于激烈未敢刊登。胡秋原主编的《中华杂志》审读该文,颇为赞许,将标题改为《保卫钓鱼台》,刊于11月出版的《中华杂志》上。

同期,《中华杂志》刊文《我们应有的决心》,提出:“中国每一寸土地都是我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我们软弱,我们沉默,人家就以为我们好欺侮。日本人为了抢我们钓鱼台群岛已发动了示威游行,我们绝不能拭目以待的任人宰割。”“难道五十年后的这一代中国青年,真的就要眼睁睁的看着我们的国土让列强们用‘声明’‘密约’而断送吗?我们虽弱,但是我们是具有国格的国民。我们的上一代用鲜血和头颅所争回来的钓鱼台群岛,难道真要由我们的手中断送出去吗?”^②这些言词慷慨激昂,激起台湾青年学生的强烈共鸣。

蒋介石政权在钓鱼岛争端的表述上,含混委婉,尽力争取大陆礁层的石油资源,不敢发表严正抗议,更不敢采取军事行动,收复钓鱼岛。1970年10月以后,台湾的主流报刊基本上不再报道钓鱼岛争端的消息和评论,民间的反日声浪也被管控。

三、美国保钓运动对台湾青年的激励

美国政府要将中国领土钓鱼岛交给日本,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形成了一场以海外台湾留学生为主的声势浩大的海外保钓运动。

1969年,台湾青年林孝信赴美国留学,创办《科学月刊》。林孝信在芝加哥负责组织美国的稿件,美国各大学校园都有联络人,负责联系在美国工作的台湾学者或留学生写稿。

1970年11月,王晓波在《中华杂志》第8卷第10期上发表《保卫钓鱼台》一文,传到美国普林斯顿的威斯康星大学。胡秋原的儿子胡卜凯看到这篇文章,联络《大风杂志》社一批台籍青年沈平、李德裕、陈磊等,通过林孝信的《科学月刊》,联络全美各地的留学生,决定发起示威游行。

1971年1月29日、30日,美国各大城市的中国留学

^①《保卫钓鱼台》,春雷系列编辑委员会主编《峥嵘岁月——保钓运动四十周年纪念专辑》下册,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71—72页。

^②《我们应有的决心》,《峥嵘岁月——保钓运动四十周年纪念专辑》下册,第76页。

生及青年 在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等地举行了示威游行。他们示威的对象主要是美国各地的日本总领事馆和领事馆。参加人数约 1200 人。

对于海外的保钓示威,蒋介石政权根本管不到,但也不能不表达看法。2月1日,台北《中央日报》低调报道了中国留学生在华盛顿等地的示威游行,肯定留美学人的爱国行动,间接指出其中亦有不足之处。

2月中旬,台“教育部”国际文教处处长姚舜赴美,走访留美人士,就钓鱼岛问题说明台湾当局的立场与措施,听取留美人士的意见,劝导青年学生要安心学业。引起一部分学生的反感。

3月6日,国民党党员陈鹏仁在香港《新闻天地》杂志上发表文章《冷静处理钓鱼台问题》,指出“至今日为止,我们还不能正面地提出决定性的证据来证明钓鱼台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历史上的记载固然可以说是一种证据,但不能做为主张主权的决定性的证据。而在人们所提出的几个证据中,我认为所谓旧台北州与冲绳县有关钓鱼台管辖问题争讼的判决,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说出的最有力证据。可是对于这项证据,只是在说,并没有人能够提出它的判决书。”“政府还没有决定性的证据去争取钓鱼台的主权,而学生却偏偏要政府去争,我想这是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是即我认为学生的欲强政府去做在法理上尚做不到(至少到今日为止)的事,这个事实或将使此运动走上反政府之路。”^①征诸以往的经验教训,这篇文章道出了国民党内一些人士,对海内外保钓运动的深深忧虑和担心,希望青年学生适可而止。

面对海外一浪高过一浪的保钓运动,台湾官方的报纸按照反共逻辑,不断影射或暗示海外保钓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操纵和利用,来为自己的软弱退让做辩护。

在美国的中国知识精英深感不妥,对台湾当局的妥协行为感到愤慨。3月10日,中国旅居美国教育界、科学界人士王泽霖等523人上书“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钓鱼台群岛为中国领土,法理史实均确定无疑。同人等谨请政府保持坚定立场,抵抗日本新侵略,并在钓鱼台主权问题未解决之前,请坚决拒绝参加所谓‘中日韩联合开发海底资源协议’之签订会议。”^②

台湾当局不得不做出回应。3月18日,“总统府秘书长”张群致函旅美学人:“(一)钓鱼台列屿主权之归属。政府对于此项问题之处理至为郑重,因本案关系国家领土主权,寸土片石,亦必据理全力维护。”“(二)关于中日韩三民间代表商讨共同开发海底资源问题。中日及日韩间多年来即有民间组织之中日合作策进委员会,及日韩合作策进委员会,研究彼此间之友好合作方案,此二合作策进委员会,于五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在汉城举行联席会议,研究三国间经济方面共同合作之可能性,并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东京举行会议,就共同开发三国有关海洋资源问题,包括渔业科学研究及公害防制等项,广泛交换意见,并未议及具体方案。”^③

蒋介石政权耗费巨资,派遣了一大批学生赴美留学。如果不能对留美学人善加引导,有可能使这批青年学生对国民党政权离心离德。蒋介石政权继续封锁岛内新闻,对在美同胞采取疏导措施,试图平息事态。

美国政府不顾中国人民的呼吁,多次表示要如期将钓鱼台的行政管辖权交给日本。留美学人十分愤怒。4月10日下午,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保钓示威浪潮,2500多名以全美各地留学生为主的华人齐聚华盛顿,在林肯纪念馆前集合,整队出发,伍鸿熙、朱耀奎、刘扬声进入美国国务院,提交抗议书。再到台驻美机构前游行请愿,要求台湾当局立即采取行动,保卫钓鱼岛的主权。程君复、陈智榕、葛实俊进入“大使馆”,向周书楷“大使”递交一封“致中华民国政府”的公开信。学生高呼“保卫钓鱼台”、“打倒日本军国主义”、“钓鱼台,我们的”、“反对出卖钓鱼台”、“打倒国际阴谋”等。张智北、廖约克痛陈国民党政权对钓鱼台事件的昏庸失职^④。

对海外保钓人士的强烈呼吁与主张,台湾当局很难接受并执行,颇为难堪,亦不便反驳。在岛内外的重压下,台湾当局只得终止与日本合作探测东海大陆架的石油资源。

尽管国民党当局严密管控台湾的传媒,非经宣传主管部门的允许,各大报刊杂志不得报道海外的保钓运动。通过人员往来、信件、电话、无线电收音机、海外媒体等,留美学人保钓示威游行的消息及保钓刊物还是经多种渠道,进入台湾岛内。蒋介石政权必须表明自己的严正立场。

4月12日,台北《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坚决维护钓鱼台列屿主权》:“钓鱼台列屿为中国的主权,法理和史实,凿凿有据。第二次大战之后,美国占领琉球,虽在旧金山和约中自日本方面取得钓鱼台的行政权,及虽因防

^①《冷静处理钓鱼台问题》,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四组编《钓鱼台列屿问题资料汇编》,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178—179页。

^②《旅美学人上蒋介石书》,《钓鱼台列屿问题资料汇编》,第30页。

^③《张秘书长奉命说明钓鱼台案》,台北《中央日报》1971年3月19日,第1版。

^④《四一〇全美中国同胞华府示威纪要》,林国炯等编《春雷声声——保钓运动三十周年文献选辑》,台北人间出版社2001年版,第351—356页。

卫上的便利,偶或派遣舰艇,巡弋至钓鱼台海域,而视其为琉球防卫的一环,但钓鱼台列屿自始不属于琉球群岛,所以美日两国对钓鱼台列屿,自始无处分的权利,双方所作的任何协议,无论就事实及国际法原理,对中华民国亦自始无效。”^①同日,该报低调报道了4月10日“我旅美教授及学生聚集华府游行请愿,抗议美支持日对钓鱼台主张”。

四、台湾青年学生发起保钓集会

台湾当局的妥协行径,激起了广大台湾民众的强烈不满和义愤。在海外保钓运动的影响下,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积极行动起来,谴责美日帝国主义的侵略,抗议当局的妥协退让。

1971年4月,《大学杂志》发表93名知名学者和企业家联名的《我们对钓鱼台列屿问题的看法》,认为“钓鱼台列屿在历史上,地理上与法律上应为中国领土台湾省的不可分割部份,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外国以任何方式侵占我国这片领土,并坚决支持我国政府维护该列屿主权的措施。”^②学术界人士丘宏达、吕俊甫、李钟桂、丘宏义、李怡严等签名,声明坚决反对任何外国以任何方式,侵占中国领土。

在留美学人保钓运动的鼓舞下,4月,从成功大学开始,台湾各地的青年学生纷纷发起示威抗议活动,主要学校有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淡江文理学院、海洋学院、逢甲学院等。青年学生散发传单,高呼口号,号召全体中国人民联合起来,保卫钓鱼岛,保卫中国的领土和主权。来自香港、澳门、东南亚等地的“侨生”在台湾无所牵挂,较少顾忌,冲在游行队伍的前列。

4月12日下午,台南成功大学学生30余人,为钓鱼岛主权事,向台南美国新闻处长提出抗议,该处长接见了这批学生。

13日晨,台湾大学校园内出现爱国标语,引起了学生们的关注,大家纷纷讨论如何维护钓鱼岛的领土主权。下午,城区中心的台大法学院出现了爱国标语,主要有“我们坚决支持政府对钓鱼台的坚定立场”、“我们台大誓为政府后盾”、“要求美国政府尊重我国主权”、“我们严正抗议美国政府的偏颇声明”、“反对日本的无理要求”、“奉劝日本勿蹈军国主义的覆辙”。

13日上午,台湾师范大学学生表达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在校园内张贴标语,“我们反对美国将钓鱼台交给日本”、“我们要到钓鱼台去钓鱼”。

14日上午,“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接见了一些大学的青年助教,劝告他们不能使社会陷于混乱。

14日上午,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学生代表60余人,前往日本“大使馆”及美国“大使馆”,送达青年学生对

钓鱼岛主权的抗议书。

14日下午,台湾师范大学100余位学生,在学校图书馆前草坪上,热烈讨论钓鱼岛主权问题,一致认为“钓鱼台领土主权永远属于中国”。学生们要美日两国绝不能再作偏颇的声明和无理的态度^③。

14日下午7时,台湾电视公司、中国电视公司播出了大学生为钓鱼岛主权事的新闻。中国广播公司的晚间8时联播,也播出此条新闻。15日,台北各报都刊登了此项大学生爱国运动的消息。

16日,几位台大学生到台北“美国大使馆”,将由台大学生签名的抗议书交给美国“大使”,反对美国政府支持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要求。

17日,台北《中央日报》第3版低调报道了“学生昨续到美使馆抗议美对钓鱼台主张”。

18日,台北《中央日报》第3版继续报道了“维护钓鱼台列屿主权学生表现爱国热忱,师大学生签名誓为政府后盾,海洋淡江等学院提出意见书”。台湾师范大学学生表示“我们有高度的爱国热忱,但必须用理性的方式来表达,因为我们对国家民族,负有无比的责任。”淡江海洋学院的学生向国民党中央党部递交了陈情书:“爱国是我们青年的本性,表达爱国的意愿,只有在支持政府严正立场,拥护领袖英明决策的原则下,发出正义的心声,誓作政府的后盾,才是唯一有力的途径。”^④

同日,台湾清华大学师生发表致留美学人书“从报章杂志及朋友的通信中,我们知道各位正在为保卫钓鱼台列屿的事,作各种的努力。对各位爱国的情操,我们谨致最大的敬意。我们并希望这一件事增加了海内与海外同胞们的团结,不仅对领土的保卫,而且对祖国的建设,支持政府,同心协力,贡献大家的力量,以求达到自强的目的。”^⑤这些报道、措词实际上是国民党宣传部门精心策划的,意在为保钓集会降温。

20日,台湾师范大学学生“上书给政府,表示坚决支持政府保卫钓鱼台列屿,并抗议日本政府危害我领土主权,及美国政府擅自主张将钓鱼台交给日本的行为”。

^①《坚决维护钓鱼台列屿主权》,台北《中央日报》1971年4月12日,第2版。

^②《我们对钓鱼台列屿问题的看法》,台北《大学杂志》1971年4月号,第17页。

^③《台湾学生的示威游行》,《春雷声声——保钓运动三十周年文献选辑》,第513页。

^④《学生表现爱国热忱》,台北《中央日报》1971年4月18日,第3版。

^⑤《清大师生发表致留美学人书》,台北《中央日报》1971年4月18日,第3版。

21 日,台北《中央日报》报道了台湾师范大学、中兴大学学生的保钓活动^①。

这些保钓示威集会活动主要发生在台北市,主要集中于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等高校,人数较少,抗议行动较为平和、理性,对台湾社会的冲击力不大。

保钓运动唤醒了台湾青年的爱国热忱,沉寂多年的台湾校园一时兴起了“关心国事”、“讨论国事”的热潮,长期以来“学术孤立于政治,政治自外于学术”的氛围被打破。

国民党政权在大陆遭到彻底的失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未能正确引导青年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血的教训使国民党上下对青年学生的保钓运动深深忧虑,害怕重蹈覆辙,引火烧身。保钓青年提出“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诉求,“外抗强权”指向私相授受钓鱼岛的美国政府、日本政府,“内除国贼”此“国贼”很容易引伸为对美日妥协退让的国民党公职人员。保钓青年打着反日的旗号,容易得到社会大众的共鸣,发展下去,势必冲击台湾的威权体制。国民党政权面有难色,进退两难。

为了稳定校园,避免青年学生掉转枪口,指责国民党政权软弱无能,不敢出兵收复钓鱼岛,不敢向美国政府、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出卖钓鱼岛主权,台湾当局立即采取措施。台北市是台湾高校的集中地,台湾大学则是台湾第一高等学府,稳住台大则可稳住台北市,稳住台北市则可稳住全台湾。对台大学生的疏导成为国民党政权管控保钓示威的重中之重。

4 月 16 日,台“教育部长”罗云平发表谈话,指出:“政府对维护钓鱼台的主权有坚定信心的。但需要较长时间去解决,不是短时间可以达到的。”他呼吁,“青年学生们应该冷静,要以合理的动作来表达大家爱国的诚意”,“应该冷静地等待政府处理这一问题,大家还是应该安心读书,这才是正常的报国之道”^②。

对于青年学生的集会抗议,只能是“可顺不可激,可散不可聚”。国民党政权一方面肯定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同时,将其请愿、示威的诉求,引导到支持当局对美政策的轨道上,支持当局的保钓方针,反对冒险激进的诉求。

国民党政权派出一批高官、专家学者,前往各大专院校进行疏导,引导青年学生向大处看、向远处看。20 日晚,“台湾大学学生保卫钓鱼台委员会”在校体育馆举行成立大会。大会结束后,召开了“钓鱼台问题座谈会”,由钱永祥、张晋城主持,应邀出席的校外人士有“外交部”发言人魏煜孙,“立委”胡秋原、李文斋、谢仁达,“教育部”国际文教处处长姚舜,政治大学教授丘宏达。魏煜孙希望同学们“了解政府,信赖政府”。

21 日,新任“外交部长”周书楷,由北美司司长钱复、台大校长阎振兴陪同,至台大演讲,阐述“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钓鱼岛争端,希望青年学生“要信任政府”。

同日,“教育部长”罗云平发表谈话,指出政府对维护钓鱼台主权有坚定的信心,但问题的解决需要较长时间的,呼吁青年学生保持冷静,以合理的方式来表达爱国热诚,大家的意见可以书面方式交学校或送有关机关加以整理,作为向外交涉的参考。他促请学校校长转告学生,不要再作集体游行,或校际之间联络活动,信赖政府,安心读书,才是正常的报国之道。

22 日,台北《中央日报》发表社论《信赖政府,安心向学》,指出“领土主权的争执,有一定的国际常例与方式可循。一般总是以外交谈判方式谋求合理合法之解决。而此种交涉谈判,不是短期内所能达成”。“我们希望青年同学们体认求学即为报国的准备,我们现在既以热烈的感情与适当的行动,表现出维护国家主权,愿为政府交涉后盾的决心,就应该信赖政府,安心向学,恢复正常的学校生活,以学业的成就来贡献国家社会。”^③国民党政权呼吁青年学生,要认识到钓鱼岛争端的长期性与复杂性,将主要精力放在学业上,不可分散精力,徒劳无益。

青年学生一般年纪在 20 岁至 30 岁间,精力旺盛,血气方刚,思维敏锐,求新求变,好胜心强,无家室之累,急欲向社会大众证明其志向与能力。能捧不能压,能伸不能屈。在社会变革时期,他们往往冲在最前列,充当引领社会风潮的角色。但他们毕竟年轻,缺乏政治经验,激情有余,历练不足,难以拿捏游行示威的尺度。如果不加以正确引导,往往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国民党当局深知青年学生上街游行示威的激进与风险。5 月,《大学杂志》刊出《与陶希圣先生一席谈——从钓鱼台谈起,看今日青年方向》一文,台湾《中央日报》董事长陶希圣以青年时期参加五四运动的亲身经历,指出“关于维护国家立场,这是一个长期的奋斗,决不是一个大的运动就能解决问题,我们需要沉着,需要坚定,需要一个长期奋斗。我们不想把它渲染,也不会故意冷淡,就《中央日报》来说,我们要以沉着坚定的立场来看这个运动,不知道青年学生是否能够谅解?”“学生运动一定要适可而止,到时候就告个段落”,“如果

^①《对钓鱼台列屿主权师大、兴大学生续有表示》,台北《中央日报》1971 年 4 月 21 日,第 3 版。

^②《罗云平盼青年学生保持冷静安心读书》,台北《中央日报》1971 年 4 月 17 日,第 3 版。

^③《信赖政府,安心向学》,台北《中央日报》1971 年 4 月 22 日,第 2 版。

达到成功就可以小休了,同时要防止路旁边人的鼓掌叫好,这是要不得的。”^①“杀君马者道旁儿”,虽然是世故之言,也道出被捧者往往沉醉于虚幻的声誉,忘乎所以,马失交蹄。年轻人极易犯此种顽疾。陶希圣的一番逆耳之言,一些保钓青年很难听得进去,指责陶希圣世故、圆滑,当缩头乌龟,为国民党政权的软弱妥协打圆场。

经过台湾当局的劝说及严厉控制,台湾青年学生的保钓集会基本保持在法律可以允许的范围内,没有向中、小学校扩展,也没有将底层的工农大众引入其中。

五、“六一七”示威游行

面对全球华人的保钓运动和中国大陆、台湾的反对声音,美国政府认为将钓鱼岛交给台湾管辖会损害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利益。按照原定计划,1971年6月17日,美国和日本签定了《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美日协定》:“确认了根据协定第二条之规定,归还的南西诸岛为1953年12月25日美国民政府第27号布告规定的地域,尖阁列岛包含在归还日本的领土范围内。”^②

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私相授受中国的固有领土钓鱼岛,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对此,6月17日晚,台“外交部”发言人魏煜孙发表谈话“中华民国政府与人民对其拥有领土主权之钓鱼台列屿,亦竟于此次转移中连同琉球群岛一并交予日本一点,认为绝对不能接受。中国政府兹再郑重声明,美日两国政府立即采取合理合法之措施,以尊重我对该列屿之主权。”^③

1840年以来,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为了国家独立、民族富强,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慷慨悲歌。他们引领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理性的民族主义推动了近代中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逐渐转变为一个现代独立国家。一些狭隘的、盲目的民族主义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

由于地缘的关系,近代日本几次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伤害。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是以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为主要内容与目标指向的。同时,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人又曾“以日为师”。很多台湾民众对日本爱恨交加,充满着复杂感情。

保钓游行示威不是为了个人的经济利益,而是举着爱国主义的旗帜,是为了国家民族,是反对日本右翼,极易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关注和同情,甚至支持。保钓青年认为,保钓游行示威根本不需要申请,也没有不被批准的理由。国民党政权对他们简单打压,粗暴禁止他们的游行示威,只会火上浇油,适得其反,招致更大规模的抗议。

针对美日签署“归还琉球协定”,台大保钓会决定于6月17日发动示威游行。台湾当局获悉,大为紧张,下令绝对不准再有示威情形。台大校方不敢自作主张,请

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树。堵不如疏。国民党高层经过慎重研讨,总结了前阶段管控反日示威集会的经验教训,决定把青年学生的行动限定在法制的框架内,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同意他们的合法游行示威,附上4项条件:“1、人数愈少愈好。2、节目愈简愈好。3、路线愈短愈好。4、时间愈快愈好。”严禁闲杂人员加入游行队伍^④。

在各校、各班级国民党党工的监管下,6月17日,台北2000多学生举行游行示威。经过校方的严密规划、组织,台湾大学学生没有步行,而是乘着专车,至美国驻台“大使馆”前,警察划定游行示威的范围,将其圈起,张台雄宣读抗议书,另外两位同学递交抗议书“根据‘开罗宣言’及‘波茨坦宣言’,日本之主权仅限于本洲、北海道、九州、四国及盟国所认定之诸岛屿。故贵国擅将琉球交付日本,不但违反琉球人民之意志,并且破坏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以及出卖了其他盟国决定琉球未来地位之权力,尤其荒谬的是将属于中华民国的钓鱼台列屿送给日本。我们警告贵国,中华民国的主权是不容出卖的,中华民族是不可轻侮的民族,美国此举,不但严重的侵犯了中华民国的主权之完整,并且引起了亚洲人民的公愤。我们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式的‘慕尼黑’在亚洲重演。”^⑤呼喊口号“保卫钓鱼台”、“钓鱼台是我们的”、“中华民族不屈服”、“中国人站起来”,反对美日私相授受钓鱼岛。

台大学生又至日本驻台“大使馆”前抗议,递交抗议书“我们国立台湾大学的全体学生向贵国政府抗议,抗议你们联合美国侵夺属于中华民国的钓鱼台列屿。根据日本接受的‘开罗宣言’及‘波茨坦宣言’,日本放弃以武力侵略所得的所有土地。而今你们第一步要求归还琉球,第二步竟欲侵夺属于中华民国的钓鱼台列屿。因此我们疑虑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复活的征兆,这是‘东亚共荣圈’把戏的重演。”^⑥

^①《与陶希圣先生一席谈——从钓鱼台谈起,看今日青年方向》,台北《大学杂志》1971年5月号,第18页。

^②《美日关于琉球诸岛和大东诸岛的协定》,《钓鱼台群岛(尖阁诸岛)问题·研究资料汇编》,第248页。

^③《对钓鱼台列屿主权我再表明坚决立场》,台北《中央日报》1971年6月18日,第1版。

^④《六一七学生示威纪实》,《春雷声声——保钓运动三十周年文献选辑》,第517页。

^⑤《致美国政府抗议书》,《春雷声声——保钓运动三十周年文献选辑》,第523页。

^⑥《致日本政府抗议书》,《春雷声声——保钓运动三十周年文献选辑》,第524页。

台大大学生发表《告全国同胞书》：“今天我们台湾大学的学生列队到美日大使馆前示威，乃是要证明中国的领土主权绝不容侵犯，我们要向历史交待，我们要向世人宣称：中华民族是一个永不屈服的民族！任何的侵略阴谋均将被我们的正义铁拳击碎！”^①

这些声明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了美日私相授受钓鱼岛，表达了台湾青年学生的愤慨，与国民党政权的声明基本保持一致，没有指责国民党政权的软弱退让，坐视美日私相授受。

许多警察维持秩序，用绳索将抗议场地围住，严禁闲杂人员进入。抗议结束后，校方又用专车，将学生迅速接回校园。由于是用专车接送，划定抗议范围，因此，示威游行避免了闲杂人员加入。学生素质较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表达了合理诉求，和平落幕，没有对台北市交通、社会秩序造成冲击^②。

国民党政权对“六一七”示威游行给予了正面的评价，来化解学生的疑虑，疏导学生的不满情绪。6月19日，台北《中央日报》在第2版刊发了通讯《我国留美学生抗议美日擅签琉球协定》，报道了6月17日留美学生在华盛顿的保钓示威，并刊发社论《知识青年奋斗的方向》：“为抗议美、日两国损害我国领土主权，满怀爱国热情的我国青年学生，前天也分在国内及美国各地，举行示威游行，向美国国务院及美、日两国驻华使馆，表示庄严的抗议，自将为政府对外交涉，增加积极支持的力量。”称这一代的中国青年“对国是的爱护，真诚而挚切，对国是的见解，沉着而理智，不象美日青年那样幼稚浅薄，急躁冲动，容易为人所利用。他们都能深深体会当前国家境遇的艰苦，个人的命运系于国族的命运，个人的前途也取决于国家的前途，个人与国家可说安危一体，休戚与共。”训导青年学生要记住“反共复国的大业”，“面对任何横逆与挫辱，都要沉得住气，要记住我们目标何在”，“我们弄清了这些问题，才能处变不惊，誓耻图强，以争取最后胜利，完成革命大业”^③。这些以正面表扬为主的文字，青年学生大致能够听得进去，觉得他们的示威游行得到了当局的认可、社会大众的肯定，不输于在美国的保钓学长，无愧于五四前辈。

在反共政策的主导下，蒋介石政权根本无力挑战美日对钓鱼岛归属的安排，坐视日本重新占有钓鱼岛。国民党政权不敢正式抗议，不敢出兵占领钓鱼岛，反而压制台湾岛内的学生示威。台湾青年学生的游行示威也不可能阻止日本对钓鱼岛的侵占。在当局的严厉控制下，保钓运动走向沉寂。

示威游行是政治运动的初级形式。示威者通过公开的集体活动，表达主张，引起社会注意和同情，扩大影响力，本身并不足以解决实际问题。“六一七”示威游行

后，如何将保钓运动持续下去，是需要深思的问题。

1972年5月15日至今，日本对琉球群岛中南部地区、钓鱼岛、大东诸岛等岛屿进行行政管辖。美国不拥有琉球群岛的主权，继续在琉球群岛无限期驻军。美国从来没有承认日本对琉球群岛、钓鱼岛拥有合法主权。

六、青年学生要求政治改革

台湾青年学生的保钓示威是自发的爱国运动，遭到国民党政权的控制打压。在台湾的侨生主动发起，冲破国民党政权的严密限制，一呼百应。1950年以来，台湾青年学生第一次集体表达了他们的政治见解。示威抗议只是群众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却锻炼了青年学生，冲破了台湾大学校园的沉闷局面。一批进步青年学生深感保钓运动任重道远，决非几场游行示威就可以解决问题。他们开始将保钓与台湾命运、中国前途结合起来。

1971年6月，《台大青年》刊文《几句自我勉励的话》指出：“‘钓鱼台事件’对我们青年是一项考验，可喜的是我们绝大多数的青年朋友都被证明是经得起考验的。”“我们都是知识青年，决不是只有迷信的义和团，但我们要做一个堂堂正正，在世界上能挺得起胸膛，直得起腰杆的中国人！我们应该是一个有尊严的民族，不能让外国的资本家老是来掠夺我们的市场，不能让外国政客老是来谈论我们国家地位问题。要能做到这些就必须自立自强。”“‘保卫钓鱼台运动’是一个起点，我们体认到作一个中国人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这个民族的苦难的十字架必须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扛起来。”^④一批青年学生自觉采取行动。台湾大学哲学系学生王杏庆主动放弃美国的奖学金，坚决留在岛内，投身政治运动。大一学生林正义主动放弃台大学籍，投考陆军官校，表达爱国决心。林正义驻守金门时，游向大陆，后改名林毅夫。青年马英九决定以研究钓鱼岛为主攻方向。

国民党政权推行独裁统治，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政治腐败，沉痾日深。要保卫钓鱼岛，必须首先改革台湾的政治弊端。1971年7月，《大学杂志》发表声明指出：

^①《告全国同胞书》，《春雷声声——保钓运动三十周年文献选辑》，第522页。

^②《六一七学生示威纪实》，《春雷声声——保钓运动三十周年文献选辑》，第518—522页。

^③《知识青年奋斗的方向》，台北《中央日报》1971年6月19日，第2版。

^④《几句自我勉励的话》，《峥嵘岁月——壮志未酬——保钓运动四十周年纪念专辑》下册，第206—207页。

“不先解决钓鱼台列屿问题,我们绝不承认任何有关琉球主权的安排。”“琉球群岛的法律地位根本未定,美日双方擅自‘移转’琉球行政权,应属无效。”“所谓政治革新,并不只是行政效率的提高,而是全盘政治体制的根本革新。我们始终相信,只有健全而现代化的内政,才能建立不可轻侮的国际地位,才能奠定成功外交的坚实基础。基于此,我们沉痛地呼吁当局,为了肆应今后非常的国内外情势,必须拿出非常的气魄,彻底地革除一切积弊,起用有真才、有胆识的新人,来共同建立各项现代化的制度,并开放公平的发展机会。同时我们坚信,只有从内政的彻底革新上着手,才能厚植国力,抵御外侮!”^①

由于受到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台湾青年学生一度沉迷于自由、民主等抽象观念,空虚颓废,与现实生活严重脱节,于改善人民生活毫无助益。能够进入大学读书的青年人,家境相对较好。他们接受高等教育,衣食无忧,远离工农大众,滋生出对工农的冷漠、轻视。

青年学生基于纯真的理想与热情,自发示威游行,在校园中展开保钓,缺乏权力意识与利害关系。他们的一腔热血遭到了扑面冷水,促使他们政治觉醒与反思,开始诉求人文关怀,伸张正义,同情弱势的工农大众。族群、工人、农民、原住民、妇女问题成为台大校园热议的话题。一批青年学生立志“走出象牙塔”,提出“百万小时奉献”。他们成立“台大社会服务团”,走进社区,走进工厂,走进农村。

他们关注农村问题,包括农村机械化、肥料换谷,以及农村青少年问题,如婚姻、教育、就业。他们关注都市贫民区问题,包括生活水准、就业、子女教育的改善。他们关注劳工问题,包括童工、女工、工时工资、福利、厂矿安全。他们关注警民问题,包括交通、摊贩、便民工作。他们关注选举问题,包括“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地方选举、国民党的选举政策等。

台大学生发起的“百万小时奉献运动”是一个观念的革命,大学生参与社会、了解社会,打破了知识分子的骄矜,社会上不再有心理上的阶级和特权,拆毁了大学与社会之间的隔阂,知识即责任,即参与的一种方法,激发青年参与社会建设。

台湾青年学生的保钓运动继承和发扬了五四青年爱国运动的精神,延续了日据时期台湾人民的抗争意识,是发展中地区人民的政治自我觉醒。他们的保钓行动虽然未能阻止美国将钓鱼岛交给日本,但对青年学生的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台湾青年自觉地将保钓运动转换成台湾政治民主运动。1972年12月4日,台湾大学开始“台大民族主义论战”,拉开了战后台湾校园第一次的统独论战。台大

校园出现民主抗争,反对派学生形成竞选代联会主席的非正式党外联盟,大获全胜。他们召开争取言论自由和民主生活的座谈会,举办“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的辩论。台湾的民主运动开始突破禁区,直接或间接地培养了许多民主运动的骨干。

保钓运动表明,分裂的国家很难保护争议中的领土。1973年5月14日,《台大法言》刊文《祖国啊祖国!你何时才壮大》一文,“从五四到钓运,日本对我国领土的野心从不放弃,国际间对我主权的任意破坏从不终止,然而历史也向我们证明,每当国家民族多难之秋,一定是知识分子首先揭竿起义救亡图存,从五四到北伐,从北伐到抗战,从抗战到剿匪,再到年前的保钓运动,证明我们知识青年还不曾放弃过维护国家主权的神圣使命。”“这一切都只在表明我们衷心的期望——我们泪祷祖国的壮大!然而我们俯首细思,瞻望前程,却忍不住要问:祖国啊,祖国!你何时才壮大?”^②青年学生从美、日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和台湾当局的软弱无能中看清了国际强权政治的本质,产生了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得出了这样一条结论:要保卫钓鱼岛,维护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必须走海峡两岸统一之路,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国。由此产生了关于台湾前途的大讨论。保钓运动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和平统一运动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美国为了维护其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利益,扶植日本来对抗苏联、中国大陆,不顾中国人民的反对,于1972年擅自将琉球群岛、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行政管辖权交给日本。在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坚持钓鱼岛属于中国,动员部分民众,反对美国将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交给日本。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为主体的海外华人发起了保钓运动。在海外保钓运动的鼓舞下,台湾青年学生自发组织起来,集会游行,抗议美日私相授受。国民党政权加强对保钓游行示威的管控,疏导青年学生的激情。保钓运动改变了一些青年人的世界观。他们开始关注台湾社会的现实问题,深入民间,走进社区,要求政治革新,展开了关于台湾前途的大讨论。

作者简介:褚静涛(1966—),男,江苏淮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汪谦干

^①《严厉警告美日政府侵略钓鱼台声明》,台北《大学杂志》1971年7月号,第2—3页。

^②《祖国啊祖国!你何时才壮大》,《峥嵘岁月——壮志未酬——保钓运动四十周年纪念专辑》下册,第129页。